

女

性

研

究

丛

书

她们拥抱太阳

——北大女性学者的足迹

魏国英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K825.4
59

91985

女性研究丛书

她们拥抱太阳

——北大女学者的足迹

主 编 魏国英

副主编 王达敏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新登字(京)159号 083/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们拥抱太阳:北大女学者的足迹/魏国英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8

(女性研究丛书/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主编)

ISBN 7-301-02774-5

I. 她… II. 魏…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知识分子-女性-生平事迹 IV. ① I 25② K825.4

书 名: 她们拥抱太阳

著作责任者: 魏国英

责任编辑: 陈洁

标准书号: ISBN 7-301-02774-5/I · 362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 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印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273 千字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15.00 元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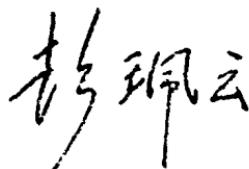
为迎接和庆祝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了《她们拥抱太阳——北大女学者的足迹》一书。书中几十位女学者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奋斗的经历，坦露了人生之旅的求索与奉献，给人以激励，给人以启迪。我愿意把她推荐给全国的姐妹们。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是开妇女解放运动风气之先的一所著名学府。

北京大学，从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至今已有97年的历史。1920年2月，在当时校长蔡元培先生支持下，王兰、奚湧、查晓园三名女生首批入北大文科旁听。这一年暑假，北大正式招考录取了九名本科女生，首开我国大学男女生同校学习之先河，成为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解放史上的一个创举，影响波及全国。此后，国内各大学亦陆续兼收女生。与此同时，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应蔡元培校长之聘，也开始在北大任教。在其后的七十多年中，北京大学许多女教师、女学生，以才华、青春和生命贡献于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华夏文化教育的繁荣，贡献于中华民族的崛起与进步，贡献于妇女自身的解放和发展。今天，在北京大学七千四百多名教职工中，女教职工有

三千二百人，约占百分之四十三；在二千五百多名教师中，女教师就有七百人，其中有高级职称者约占全体女教师的百分之五十四。她们已成为北大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一支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

我曾在北大工作过，深感北京大学女学者们敬业献身、进取创新精神之可贵。她们孜孜不倦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科学，追求事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耕耘不息，拼搏不已。我祝愿北大的姐妹们永远走在中国知识妇女的前列，祝愿全国妇女同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新的贡献。



1995年2月

目 录

序 彭珮云(1)

忠于祖国	齐 香(1)
我的读书生涯	赵萝蕤(7)
求学	高小霞(14)
女儿当自强	冯钟芸(21)
无悔人生	曹宗巽(25)
流金岁月	喜 勋(34)
追求	江德爱(41)
崎途履痕	胡适宜(47)
探索	张寄谦(53)
孜孜砥砺	郑必俊(58)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李一华(67)
坦途在前	蔡沐培(73)
峥嵘年华	张康琴(81)
走出高原之城	乐黛云(89)
追寻中走向未来	孙静云(99)
回忆两则	贺慕严(107)
闪亮的日子	李文绚(116)
登攀	唐孝炎(121)
强我战胜弱我	孙小礼(126)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杨芙清(134)
圆梦	陈松岑(140)
燕园秋忆	杨 澄(148)
甘苦寸心知	张丽霞(157)
进取不息	王文清(164)
击浪奋励知春暖	李秀琴(170)
痴情于文学的俄罗斯	徐雅芳(182)
透过时光的沉思	桂琳琳(190)
燕园,我的人生起点和归宿	傅世侠(194)
读“闲书”	孙凤城(202)
鸿雪小记	朱 宜(209)
缘分	耿引曾(217)
鬓如霜 又何妨	陈诗闻(224)
旧事如烟	吴瑾光(232)
我是最富有的	彭崇慧(238)
回眸	郭崇德(244)
一份属于自己的天地	温功碧(251)
记忆中的浪花	胡健颖(258)
最佳舞台	李国辰(265)
漫忆	山 蕴(272)
改行	卢淑华(278)
机遇的青眼	石青云(282)
独钟于残酷的事业	陈堃𨱇(287)
在北大成长	施蕴陵(294)
有意练功 无意成功	马蔼乃(298)
我的路	李 慎(307)

丹心绘蓝图	汪 宇(316)
让汉语走向世界	赵燕皎(321)
登书山以勤为径	李国秀(329)
往事悠悠	王 杰(337)
时代、社会与我	袁 明(346)
我的两个十五年	葛晓音(354)
迎接挑战	段 晴(362)
爱心铺成希望之路	申 丹(370)
梦·自然·我	顾红雅(377)
后记	编 者(384)

这一生，能为祖国
外语教学事业贡献力量，我感到快慰。

忠于祖国

齐香

1919年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那年虽然我才八岁，但对我思想上触动很大，这是我第一次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我年龄虽小，却常听说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伟大的五四运动震撼了中国大地，到处听到人民忿怒的呼号，连中小学也受到深刻的影响。我们二三年级的小学生也举着各色的小纸旗，跟在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们后面，参加活动：游行、讲演，听人讲外国帝国主义是如何欺侮我们，等等。我们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喊：“二十一条完全无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旅顺大连！”我虽是小学生，也明白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明明为胜利作出贡献，却被帝国主义列强作为战败国对待，强加给她许多不公平的条约。天天和小同学们跟着老师在大街小巷跑，募捐，宣传，到东安市场各商店检查日货，找出来毁掉。回到家，看到日货，气得到处扔。总之，这一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虽然已过去七十五年，那种群情激愤，真是惊天动地，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认为爱国主义应当是我们最高的思想信条。

1933年,我在北平中法大学法文系毕业,被学校送到法国里昂大学深造。我作为班上唯一的女生,自然加倍努力。当时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纷纷投身抗日前线。那时,在法国,爱国华侨,中国留学生以及富有正义感的法国人组织起各种形式的活动,从道义和物质等方面支持中国抗日运动。1937年,我正在巴黎大学读书。当时有一位华夫人是小说家,比利时人,她丈夫在中国工作,那时她正在法国,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她介绍我参加法国女知识分子组织的乔治·桑俱乐部的活动。一次,她们举行“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活动”报告会,要求我作一次关于中国妇女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的英勇活动的报告。那天约有几十名女知识分子到会,报告受到热烈欢迎,表示了她们对中国妇女的尊敬。有些人还把自己的著作送给我,如诗集、小说等,表示友好。开会前几天,曾有人对我说:“听说你作报告的那天,有日本大使馆的人去听,你全家都在北平,不怕日本人报复吗?你是否把内容说得委婉些?”我说:“我怎么思考就怎么说,日本人如此狠毒,我们决不应当连说真话都不敢!我相信我父母会赞成我这样做。”果然,那天有个日本武官出席了,我的未婚夫罗大冈正在巴黎留学,陪我一道去做报告,准备当场和日本人辩论。没想到那个日本武官听完之后,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后来我知道在日寇占领北平时,我父亲蛰居家中,不肯替日伪工作,不会见任何人,以表爱国之心。

1939年,法国向纳粹德国宣战,那时我和罗大冈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法国节节败退。在这期间,我们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海上交通已断,无法回国。四十年代初,由反法西斯的法国人同情相助,我申请得到出境证,带着孩子到瑞士,和

先以战争难民身份侨居在瑞士的丈夫相团聚。1945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马上准备回国。但是我们必须先从瑞士到法国，再从马赛港乘法国客轮回上海。回到分离了十四年的祖国，已是1947年5月了。

当时我们对国内情况并不很理解，甚至回国后能否有糊口的职业，也感茫然。听说国内混乱，物价飞涨，没有人情关系，举步维艰。甚至有人劝我们在法国找个糊口的工作，总比回国失业好。总之，是去是留，大家意见纷纷，但我们没作任何犹豫不决的考虑，无论如何，要回久别的祖国，要见久别的父母家人，于是，我们乘战后第一次中法航班的海轮远航，回到上海。

我们由人介绍，先到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法语和法国文学。后来时常有人问我们，学法文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学理工，人们都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说实话，我也说不清学法语有什么用。那时在一般大学里，法语只是作为第二外语的选修课，可有可无。

解放前夕，学校教师的生活十分动荡不安，领了工资，忙着买米面，物价一日三涨，迟一点什么都买不到了。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很多有才华的进步学生忙于参加进步的地下工作，和反动派作斗争；思想反动的学生忙着干扰破坏左派学生的活动，向反动当局打小报告。那真是一个残酷火热的斗争时期。过去我对政治不够关心，只知闭门读书，此刻我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和反动派的斗争是如此激烈，进步学生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爱国真理，而反动学生则拼命维护个人利益，不问祖国与人民为何物。

正义终于战胜邪恶，中国很快全国解放。处处是阳光，满

目是欢乐。我最初最深刻的印象是人民解放军的纪律严明，战士的可敬可爱。我永远忘不了，在旧社会，我常常作的一个恶梦：国民党大兵在我后面追赶，急得我往家里跑，吓得手发软，拍门拍不响，因而惊醒，一身冷汗。这个恶梦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解放后，真是雄鸡一唱天下白，到处呈现新的气象，令人精神焕发。大家好像重见天日，有说不出的干劲。过去我曾怀疑学了法语在中国究竟有什么用。现在全国好多大学都办起法文系、法语专业，而且一年比一年多。我和我爱人被调到清华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解放了，人民当了主人，教师工作十分起劲，学生学习十分专心！一个人恨不得干几个人的事！新中国参加了国际大家庭，随之而来的是和外国进行各种文化学术交流活动，这也就需要各种外语作为工具，法语当然是工具之一。那时我开始认识到，在各方面，只要有一技之长，都能起作用。过去我那模糊的思想：学法语是否有用，现已非常明确，不是没用，而是非常有用，不是自己知道的太多，而是远不够。

例如在纪念世界古代文化名人活动时，有法国代表团前来，当时翻译人员数量远远不足，只好抽调各校及各机构的工作人员帮助完成任务。有的教师带着当时在法语专业学习的一部分学生作翻译。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前期，经常有教学以外的任务，我本人就曾为现已故去的老校长马寅初在校内招待外国友人作过口译。

自1952年院系调整，我就被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工作。

解放后，随着各种政治学习，自己在各方面的认识有所提

高。为了赶上欣欣向荣的祖国大好形势，个人的工作也日益紧张。特别认识到外语也像别的学科同样重要，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和光荣的，培养青年外语干部是刻不容缓的事。大家干劲十足。针对客观需要，教师和学生团结一致，抛弃过去陈旧的作法，努力改进教材内容、教学方法，提高教和学的质量。比如文革以后，招收进一批工农兵学员，针对他们没有接触过外语的特点，我们又为他们重新编写了课文、语法和练习。有一位学员，文化底子很差，开始时不能理解“飞机”会是名词，在他思想中，飞机是在天空飞行的，应当是动词。可就是这位同志，勤学苦练，后来学习成绩十分优秀，现已成长为很有作为的外语干部。

在讲法语的国家里，经常能遇到从前的学生，他们已成为重要的外交官，以及在各个领域的负责人、工作者。在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翻译界，也有我们大批学生在出色地工作。看着他们茁壮成长，德智体各方面能力远远超过我们，令人欣慰。当然，单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在当前中国奋发努力的青年人之中，只是沧海之一粟，人数远远不够，质量上也还待提高；全国各大学、学院、专科，都在为培养外语人才作出重大贡献，这些人才都在外语战线上担当着各种职务，其质量与人数，和解放初期相比，变化是何等的大！实在令人鼓舞！

形势发展迫切需要沟通中国与外国的文化情况，互相了解，吸取对方长处。新中国成立不久，大家都亟于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共产党人在做什么。我在五十年代翻译了法共工人作家让·拉斐德的两部小说，他虽不是法国第一流作家，但是一位工人共产党员，感情真挚，文字朴素。第一部名《萝丝·法朗士》，书中描写纳粹势力的崩溃和法国解放前夕

的“抵抗运动”，尤其是游击队的斗争。第二本《水仙花》，主要描写法国共产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解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至死不屈的高贵品质。在八十年代，我翻译出版了法国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乔治·桑的两本小说，一本名《木工小史》，另一本是《莫泊拉》。

八十年代后，各地的法语工作者，集中力量，从编写小型工具书开始，进行颇具规模的中型词典，如：法汉词典，汉法词典等的编撰工作。为了教学更科学化，教师们努力编写各年级的各种教材。我也尽自己的力量，十分荣幸地参加了部分工作。

光阴如飞，我现已八十三岁，身患多种慢性疾病，于1986年退休。回想这一生，我由一个普通的爱国主义者，成为衷心为社会主义祖国外语教学事业贡献力量的工作者，我的路走对了，我很高兴。

齐香，北大西语系教授。1911年生于北京，1933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同年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1938年获巴黎大学硕士学位，1947年归国，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后到北大西语系任教。

我只想当一个什么
学位也没有的第一流学
者。

我的读书生涯

赵萝蕤

我父亲赵紫震出身贫寒，但到我该上学时已是苏州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也就是一个现在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在苏州圣约翰堂附近的幼稚园玩了三年，七岁进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年级，并在同年开始学英语。父亲1914至1917年留学美国，因此我一进小学不但学了英语，还开始学弹钢琴，完全是美国的那一套。但是父亲又是个祖国文化修养极深的学者。他怕教会学校不注重祖国语言的培养，又亲自教授我“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而且吟诵起来像是在唱歌。我还把这种唱法带到学校，让我的小同学们也唱起来。12岁那年苏雪林女士（绿漪）到我班上来教国语。她重视写作能力，我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双行密圈。

因为父亲亲自教导，我的语文得分总是名列前茅。老师让我跳一级，三年级未读就升到了四年级；六年级时我的语文成绩被评为全校第一，甚至超过了高中三年级的同学。

1926年父亲携带全家迁居北京。因父亲就职的燕京大学在西郊，他不愿我进城上学住宿舍，所以请了家庭教师帮我补课，十四岁时我考上了高中三年级。父亲又觉得我年纪太小，

让我读高二，1928年升入燕京大学一年级中文系。那时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如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但是到我读完二年级时，教授英国文学的美国老师包贵思又找我去谈话，劝我改学英国文学。她的理由是，既然酷爱文学，就应该扩大眼界，不应只学中文。父亲同意我转系，于是我18岁起就改学英国文学。那时的学校是很自由的；学生除上课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我酷爱读小说，便从父亲的藏书中选读了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的小说，家里没有的就到图书馆去借。后来桑美德教授开了一门小说课，我选修了，但是她要求读的小说，我差不多都已读过。在大学的四年中，我选了多门音乐课，并继续学弹钢琴。

作为女性，我能够选择的生活道路够狭窄的。我大学毕业时才20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所。

当时研究所除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但是我英语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于是我被录取了，还得了一年三百六十元的奖学金。我对父亲说，“我不用花你的钱了。”那时小灶食堂一个月才花六元，还有二十四元零花钱。我在清华学习三年，读了吴宓老师的“中西诗的比较”，叶公超的“文艺理论”，温德老师的许多法国文学课：司汤达、波德莱尔、梵乐希等，还跟吴可读老师读了英意对照的但丁《神曲》，唯一的同班生是田德望学长。与他同窗是我在清华三年中的最大收获之一。我们现在都是八十以上的寿星了，还和过去一样友好。

在清华的第三年开始了我的翻译生涯。我喜欢写诗，曾寄过三两首给上海的戴望舒先生，在他编辑的“新诗”上发表。没

有料到他约我翻译艾略特的《荒原》，一首当时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热得灼手的名作。那时温德老师已经在课堂上相当详细地讲解过这首诗，所以我就大胆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叶公超老师还为这个译本写了一篇真正不朽的序。1939年的“西洋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邢光祖先生对于这首诗的详细介绍，并评论了我的译作。文章的最后两句是“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的‘荒原’中的灵芝，而赵女士的这册译本是我国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时，父亲让我们全家都到南方去。他自己因工作在身，只留下大弟景心作伴。我们先在苏州小住，最后回到祖居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的一所旧屋。我们全家包括母亲，二弟景德，三弟景伦，梦家与我。那时我已和陈梦家结婚。新市镇是水乡，物价低廉，生活极丰盛，天天吃的不是鱼就是虾。又因无书可读，空闲太多，因此或在桥头看赶鸭子过河，或看着一担担蚕丝茧子从门口挑过。这时梦家已与闻一多先生取得联系，请他留意是否可到长沙临时大学教书。这样，我们就通过京杭国道到了南京，然后乘船到了长沙。文学院在衡山，于是又举家到了衡山。这时我们已藉朋友之便把母亲送回了北京。其余的人最后都长途跋涉到了昆明。

从七七事变以后我一直是失业的。当时西南联大继续清华大学的老规矩，夫妇不同校；丈夫在联大就职，妻子就不能在同一学校任课。而且那时物价腾贵，金圆券不值钱，教书还不及当个保姆收入多，因此在联大的八年里我基本是操持家务。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作出牺牲。但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菜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

1944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先生给梦家联系了到芝